

Wen Shi Feng Jing Xian

文史风景线

史圣司马迁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C49
41

文史风景线

史圣司马迁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史风景线 / 王卫国主编. —喀什: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乌鲁木齐: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5. 12

ISBN 7-5373-1465-9

I. 文... II. 王... III. ①文学—通俗读物②历史—通俗读物
IV. ①I-49②K-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60578 号

文史风景线

史圣司马迁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 830001)

北京市朝教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mm×1168mm 32 开

印张: 1600 字数: 30000 千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373-1465-9 总定价: 3960.00 元(共 200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前 言

21世纪是教育的世纪。教育兴则国兴，教育强则国强。

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增长，离不开文学与历史的锤炼。

文学，能够增强民族凝聚力，丰富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人的综合素质能力；历史，能够传播历史文化，提高人的历史素养，培养新时期下的人文精神，塑造人的健康人格，铸就新时代的民族灵魂。

21世纪的文学与历史教育，应该互相渗透，有机结合，使历史与文学完美统一。

正是基于这一点，在新课程改革的形势下，为了贯彻素质教育，充分体现国家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思想”，培养学生成为社会合格人才，我们组织了一些历史与文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共同编写了这套丛书——《文史风景线》。它主要介绍了历史与文学方面的知识，包括我国历代帝王的风云一生、中外历史人物的介绍、外国文学精粹、中外文学发展史话与理论漫谈以及部分文

学大师的作品介绍。内容翔实,涵盖了古今文化、历史的各个方面;知识性、趣味性、学术性兼备;语言准确、生动、深入浅出、雅俗共赏,适合广大学生阅读。

在编写过程中,难免在细节方面有不足之处,在此只希望尽我们微薄之力,给广大青少年朋友的学习与生活提供必要的帮助。

编者

目 录

第一章 司马迁的生平	1
一、司马迁之父司马谈	1
二、司马迁的童年时期	25
三、南北漫游	30
四、漫漫仕途	48
五、司马迁的卒年	103
第二章 史家之绝唱——《史记》的史学价值	108
一、博大的五体结构	108
二、《史记》的取材义例	128
三、直笔精神	136
第三章 无韵之《离骚》——《史记》的文学价值	145
一、史记在文学上的地位和影响	146
二、史记的写人艺术	148

文史风景线

三、《史记》的小说性	155
四、人物传记的文学价值	169
第四章 司马迁的思想	183
一、天人之际观	183
二、政治观	199
三、经济观	210
四、历史观	230
附录：司马迁大事年表	243

第一章 司马迁的生平

一、司马迁之父司马谈

司马谈是一个天才的历史学家和天文学家，他对《史记》的发凡起例，尤其是对司马迁精心的培养，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伟大历史人物的地位。研究司马迁不及司马谈，就是无本之木和无源之水，必不得要领。因此，在讲述司马迁的成就，“司马迁之父司马谈”这一内容是一个不可缺的。

(一) 出仕与师承

《太史公自序》曰：“谈为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集解》引岳贛曰：“《百官表》无太史公。《茂陵中书》司马谈以太史丞为大史令。”太史公即太史令，《自

文史风景线

序》又载，司马谈卒于元封元年。但他的生年、表字、确切的出仕之年，以及怎样出仕《自序》均失载。文献无证，我们只能作一些合理的推论，用以充实司马谈的传记，以期抛砖引玉，待人们考查。

《茂陵中书》简称《茂陵书》，它是汉武帝置茂陵县产生的户口簿。茂陵为武帝守陵，于建元二年初置茂陵县。司马谈属籍茂陵，他以太史丞职分参与修陵工程，因“勘定陵址，预卜吉凶”，正是太史、太卜职分以内的事。那么司马谈应在建元二年之前即已出仕，但又不能越出建元元年。也就是说，司马谈于建元元年出仕。考汉武帝初即位，于建元元年十月举贤良，罢除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拉开了独尊儒术的序幕。但这时临朝称制的窦太后尊奉黄老，所以在本次罢黜百家中没有罢黜道家。司马谈思想倾向道家，是一个有渊博学问的人，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举贤良而出仕。初为大史丞，元封三年至元封六年之间升为太史令，于是在京师供职。

司马氏远祖世守天官和世典周史，但自春秋时司马氏去周适晋，失其守而中衰四百余年，史官文化的家学实已不传。司马谈立志重振家学，不得不一切从零开始。由于他勤奋学习而作出了显绩，所以说他是一个天才而博学的历史学家。《太史公自序》在“谈为太史公”后接着

说：“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这是说司马谈的广博学问，来自师承，他出仕京师仍孜孜以求，正因出仕京师才获得了向名师学习的条件。

1. 学天官于唐都。天官，即天文学。古代人们认为天上的列星与人间君臣相对应，亦有尊卑等级，“若人之官曹列位，故曰天官”。

中国古代天文学有两个分支，一为星占家，观测恒星流蓄的隐现，用于占验，《周礼》中保章氏传其学；一为历家，推步日月五星之行度，用于制历法，《周礼》中冯相氏传其学。古代天文学与迷信混杂。星占家讲天人感应，历家讲禁忌。但天象观测和历法推步又都是实学。《史记·天官书》总结了星占学，《历书》总结了历法推步，把古代天文学科学知识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司马谈之学渊源于唐都。唐都是西汉著名的星占家，他对星占与历法两个方面的学问都十分精通。《天官书》说：“夫汉之为天数者，星则唐都，气则王朔，占岁则魏鲜。”这里将唐都与魏鲜加以区别，说明唐都是一位重实测的天文学家。《历书序》云：“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

《集解》引《汉书音义》曰：“谓分部二十八宿为距度。”即测定二十八宿的距离和角度。今上，指汉武帝。“至今上即位”，指初即位之建元元年。唐都与司马谈同时出

仕。星占为太卜属官。太史、太卜皆隶于太常。司马谈与唐都为同僚，若唐都为太卜令，与司马谈同品位，若只为太卜属官，更低于司马谈。唐都至太初元年与司马迁一起制定太初历，其年龄至多与司马谈同辈或稍晚。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可以说是不耻下问，这一精神难能可贵。唐都对于司马迁是长辈，既为其父之师，自亦当为司马迁之师。也就是说，司马迁之天文学，既承之于其父司马谈，又受之于天文学家唐都。对唐都来说，他以渊博知识为司马谈、司马迁两位历史学家的老师，自属殊荣。唐都之学，对司马氏之天文学影响巨大。

2. 受《易》于杨何。杨何，字叔元，淄川（今山东昌乐县西北）人。他是汉武帝时的《易》学大师。《汉书·儒林传》载，杨何传《易》，“元光元年征，官至中大夫”。司马谈向杨何学《易》，则是元光元年以后的事。《史记风汉书》两书《儒林传》记载《易》学师承如次：

田何为秦末汉初人，他因是田齐苗裔，被汉高祖从山东齐地徙往关中杜陵，号杜田生。田何的学生除王同外，知名者还有洛阳周王孙、丁宽，齐人服生。王同的学生除杨何外，还有齐人即墨成，广州孟尝，鲁人周霸，莒人衡胡，临淄人主父偃。这些人都在汉朝做高官。《汉书·艺文志》载《易》学之书，有周氏、服氏、丁氏、杨氏四家今文学。由此可见，汉武帝时代，《易》为显学。《易》长于变

通，太史公“通古今之变”，受益于《易》学者匪浅。

3. 习道论于黄子。黄子，又称黄生。“子”与“生”，皆尊称，史失其名。黄子为景帝时博士，是司马谈的前辈。司马谈学道论，在建元年间。这时黄子已是耄耋之人。

文景时崇尚黄老之学，黄子作为道学权威有很高的地位。《诗》学博士辕固生在景帝面前向黄子发难辩论汤武革命。

辕固生说：“汤武诛桀纣，做天子，是得民心的正义行为。”

黄子说：“帽子虽破，还得戴在头上。鞋子虽新，终究穿在脚下。桀、纣尽管失道，乃是君王，汤、武即使为圣人，仍是臣下。君王失行，臣下应当用言谏正，岂能上下错位，取而代之。所以汤、武是篡弑行为，大逆不道。”

辕固生挑动景帝表态，他说：“照你的说法，汉高帝代秦，难道错了吗？”

汉景帝制止两人争论说：“吃肉不吃有毒的马肝，不算不知味。讨论学问，避开汤、武，没人说你们笨。”从此以后，汤武革命成为忌讳的禁区，再无人敢谈论。

辕固生与黄子的辩论是景帝时的一场儒道斗争。景帝母窦太后崇尚黄老，她找岔子反击辕固生。窦太后问辕固生：“《老子》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言下之意，与儒家书比较，哪一个高。辕固生说：“《老子》这本书只配奴仆

们去读。”

窦太后大怒说：“儒家书只配罪徒们去读。”并命令辕固生到圈里去与野猪比武。汉景帝赶忙赐给辕固生一把利刀，辕固生刺死了野猪，才保住了性命，但也丢了乌纱帽。

汉武帝即位，举贤良罢黜了百家。他又重用儒生，起用赵馆为御史大夫，玉臧为郎中令，这两人都是鲁人《诗》学大师申公的学生。赵、王用事，议立明堂，派使者征召申公来京。赵、王又上疏汉武帝，请窦太皇太后归政于武帝。窦太皇太后借口赵、王二人治办景帝丧事不尽力，将二人下狱，赵、王自杀。窦太皇太后又罢了倡导儒学的丞相窦婴和太尉田蚡的官，窦婴是窦太皇太后的侄儿，田蚡是武帝之舅，两人为国之外戚，未能幸免罢官。可见这场儒道斗争的激烈。

景帝及武帝初，政治上两次儒道斗争，均以儒家失败而告终。当时皇帝在儒家一边，为何还遭失败呢？这是因为汉初黄老政治带来社会的繁荣安定。汉文帝笃信黄老，而又是贤君，窦太后是汉文帝皇后，她以文帝路线的捍卫者而临朝，当时多数朝臣都笃守道学，所以黄老之学还处于上风。不过从景帝起已开始尊儒，尤其是汉武帝，16岁即位伊始就举贤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以此为契机发动了向窦太后的夺权斗争，在

大臣中必然留下深刻印象。司马谈亲身经历了武帝初年的儒道斗争，他看到儒学的前景，因而让司马迁向董仲舒、孔安国两位今古文儒学大师学习，而自己仍坚持学道论。黄子有道学走下坡，自己处于晚景之时，得到司马谈这样稀世高才的学生，可以想见，两人如鱼得水，一个是尽心的教，一个是尽心的学。司马谈的道学修养出于蓝而胜于蓝，是西汉第一流的道学家。《论六家要旨》表现了他杰出而深邃的思想。

出仕之前，司马谈在故里自学，只能承受塾师家学，已经具有相当的渊博知识，他才能以举贤良而得官。司马谈出仕以后，孜孜以学，不耻下问，不以道学江河日下而冷落，相反更加潜心以求其精义。司马谈为重振史官绝学，他不仅付出了毕生的精力，而且还付出了超人的毅力。司马谈的为学精神，是值得学习的。

(二)论六家要指

《论六家要指》是一篇杰出的历史哲学论文，它反映了汉初黄老哲学占统治地位的情况。司马谈用“道家”的学说统一思想，认为无为政治是长治久安的法宝。

1.《论六家要指》写作的时间和背景。秦汉政治统一，要求文化思想与它相适应。所以，综合百家学说，建立统一的新思想体系是时代提出的要求。秦始皇吕不

韦集门客撰述《吕氏春秋》做的就是这种统一工作。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倡独尊儒术，得到了汉武帝的支持，原因亦在此。

司马谈作《论六家要指》的动机，以及作于何时，弄清这一背景，是领略其精微大义的关键。郑鹤声《司马迁年谱》称“论六家要指”作于元朔五年。理由是：“案《汉书·武帝纪》元朔五年丞相公孙弘请立博士弟子员，故谈发此论欤？”对于司马谈的写作动机，郑鹤声说：“所谓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者，言好儒而轻道也，故于道儒两者，辨之尤切。”郑氏从学术旨趣立论，揭示司马谈写作动机，深得《要旨》精髓，而系于元朔五年指弹公孙弘，却是立论未周。因为古代并无公开论坛报纸、刊物，开展学术论争；而独尊儒术体系确立以后，也不允许有百家争鸣。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对峙，列国纷争，各国引进人才，因而才有百家争鸣局面，各派学说，自立门户，传艺授徒。自秦汉统一，政治一体，再无争鸣背景。文景时博士并存百家，尚有一点百家争鸣的流风余韵。即使这时，较大的思想斗争，总是展开在庙堂之上，带有浓厚的政治斗争色彩。例如景帝时辕固生与黄子辩论汤武革命，武帝建元元年王臧、赵绾征鲁申公议立明堂等，表面是思想斗争，实质是政治斗争。又如，文帝时贾谊写《过秦论》《治安策》，贾山做《至言》，武帝建元元年董仲舒对《天人三策》

文 史 风 景 线

等，都是上奏朝廷，针对现实政治发表的强烈政论。如果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是针对公孙弘请立五经博士弟子，必上奏朝廷，形成政治斗争。如果真是这样，司马谈还能做太史令吗？显然不能。而且《太史公自序》亦未作这样的记载。吉春《司马迁年谱新编》认为此文于建元二年（公元前141年）司马谈在“得知窦太后第一次战胜尊儒派之后，立即写了《论六家要指》，核心是完全肯定道家”，“是与窦太后思想合拍的”，否则司马谈“在建元时是不可能让其入仕的”。照此说来，司马谈写《论六家要指》，岂不是赶潮流以为入仕的敲门砖？如果真是这样，他也只能得意于一时，窦太后死后，汉武帝岂能容他？吉春《年谱》的说法，仍可商榷。《太史公自序》揭示司马谈写《论六家要指》的写作动机，是“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也就是在大家尊儒的时尚下，司马谈坚持他的尊道立场。我们认为《论六家要指》应作于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实质的写作动机在于阐述修史的理论基础，而非上奏朝廷的政论。司马谈发凡起例的述史计划是上起陶唐，下迄获麟。获麟即元狩元年。这一断限说明司马谈着手述史在元狩初。他的《论六家要指》，就是述史的宗旨和宣言，当作于述史之前。当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体制已经确立。儒生公孙弘以布衣为丞相，封平津侯，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冲击波，竟致于“靡

然向风矣”。尊儒崇儒从上到下成了一边倒。汉武帝外伐四夷，内兴功作，文景时代的无为政治为汉武帝的多欲政治所代替。全国的宁静生活被打破了，而且翻江倒海式的沸腾起来。司马谈预感到“物盛而衰，固其变也”，他为了矫弊，也为了及时地提出警告，所以写了《论六家要指》。不过矫弊也罢，警告也罢，都只是学术上的自我磨砺，而不是上奏朝廷，卷起政治斗争。

按照这一认识，正是崇儒之风的大气候形成，这才促使基于道家立场的司马谈写了《论六家要指》。元狩元年，比郑鹤声认定的元朔五年推后只两年，但形势不同。由于元朔六年公孙弘出任丞相，尊儒之风从量变发生了质变，“靡然向风矣”。更主要的是司马谈着手述史，总结学术，清理思想，这一动机，决定了《论六家要指》，尽管有强烈的现实内容，但不是政论，而是一篇阐明构建司马氏“一家之言”的历史哲学论文。

2.《论六家要指》的内容。《要指》总括百家学说为六家：阴阳、儒、墨、名、法、道。司马谈在评论中全面肯定道家使人精神专一、与时迁移、应物变化、遵循自然、随俗办事、无所不宜。道家言“无为”，又言“无不为”，吸收各家的长处，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其他五家各有长短：阴阳家言吉凶祥，“未必然也”；但言春夏秋冬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家以